

本报记者冯源

安静地坐落在紫金港校区西南角，与南边的一条城市主干道间隔着运河和树林，门外停車場上的大小车辆来而复去，偶尔还有家长推着童车徐徐前行。

9月，学校开学，它也同时开放。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迎来了第一个秋天。目前每天大约有1500人次的参观量，而设计的参观人次最多以3000为宜。

这是一幢外形方正的四层混凝土砌块建筑，占地50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外立面主要是朴实的清水灰砖，有规律地间杂着一条条红砖。设计方是国际博物馆领域知名设计机构纽约Gluckman&Tang设计事务所，他们表示，外观灵感来自于中国用多色砖石堆砌建筑的传统。

博物馆脚踏实地，没有台阶。观众可以自然而然地步入正门。

十年成一馆

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建设历经了十多年的历史。

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回顾说，2007年12月，浙大得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艺术史学者方闻有一个“让中国艺术史回家”的夙愿，时任浙大党委书记张曦随即赴美，与方先生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2008年，方闻来到浙大，出席了“艺术史与考古学科建设讨论会”，为博物馆建设选址、规划。2011年5月22日，博物馆奠基，并于次年11月5日开工建设。

开工时，方闻因身体原因不能前来，他在贺信中表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史在西方经历了从无到有、日益发展、不断完善的艰难历程，我们这一代学者亲自见证并促成了这一过程。如今中国艺术史回归祖国的时机业已成熟，在中国高校普及艺术史教育、建立具有高水准的艺术史教学博物馆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2018年10月，方闻教授在美国去世，离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馆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为了铭记这位学者，这座博物馆中的图书馆以他的名字命名。

方闻图书馆面积2500平方米，规划收藏人类不同文明、不同时代的，和艺术与考古有关的图书、考古报告、纸本图片、电子图片、档案及拓本等，目前已经收藏图书文献约10万册。

汉唐永流传

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分为博物馆区和学术区。方闻图书馆和专业教室位于第二、三层的学术区。学术区主要面向浙江大学师生和专业研究人员。

博物馆区则位于第一层，包括展厅、藏品库房、修复展示室、学术报告厅和教育活动区等，是博物馆开展收藏、展览与公共教育的场所，其中展览面积共3500平方米。展览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常设教学标本展，服务本科通识教育教学；二是学术特展，发布相关的研究成果。

目前，有四个开馆展览同时对外开放。其中，一号展厅是“中国与世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新获藏品展”；二号展厅是“国之光——从《神州国光集》到‘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展览”；三号展厅



蔡元培（1868—1940）

“提到博物馆、文物甚至考古，公众最容易给它们贴上“宝藏”“寻宝”的标签。对此，“圈里人”并不认同。记者接触过的一些考古队员，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挖到宝贝”的说法。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所谓的“重量级展品”——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西亭记》残碑，也没有罩上玻璃罩，而是给了观众近距离观赏的机会。在他们看来，每一件藏品、展品，都有着传递文明的意义

是“汉唐奇迹之北朝记忆——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壁画数字化展览”；四号展厅则是“汉唐奇迹：中国艺术状物传统的起源与发展特展”。

“汉唐奇迹：中国艺术状物传统的起源与发展”特展，是方闻的收官之作。它通过大量视觉材料展现了中国艺术对于写实状物的探索历程，并对其发展的动因做出一定的阐释。

“这是他晚年最关心的展览，”罗卫东说，馆方希望谨以此展向方闻先生和最先开始这种思考的学者们致敬，也希望在他们的启发下，把这样的思考呈现给更多对中国艺术与文化怀有好奇与敬意的观众。

何为博物馆

博物馆是舶来品。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博物馆，是晚清状元、爱国实业家和教育家张謇1905年在家乡南通建立的南通博物苑。近年来，高校兴建博物馆蔚然成风。它们的定位正逐渐引起公众的关注。

“浙江大学的博物馆之所以命名为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是因为艺术史与考古是研究文明史、文化史的核心领域，所以我們希望它在文化史和文明史的教育、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发挥其特色和特长，尤其是弥补目前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缺乏真正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

一所大学需要什么样的博物馆



▲9月18日，观众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参观“中国与世界”新获藏品展。该展览展出的是浙江大学2009年迄今新获的部分藏品。展品来源于捐赠及购藏，内容涉及书画、碑刻、瓷器、漆器、金铜造像等。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文明史教育和研究的缺陷。”罗卫东说。

在罗卫东这些年参观过的博物馆中，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中心最大的特点是收藏、展示、研究、教学一体化，特别是还附加了一个专题图书馆，吸引全世界研究英国艺术的专家到博物馆开展研究。它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功能非常齐全，是一个全链条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建筑也非常好，是路易斯·康的杰作。”

“中国的艺术教育，在近20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综合性大学的课程设置方面，面向全校学生的考古、文博、艺术方面的课程确实不多了。”浙大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白谦慎教授也表示，树立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学院和博物馆正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命名其实是为博物馆的性质定位，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是一座考古和艺术史的博物馆。”白谦慎说，“它的必要性就在于推进大学教育中的考古和艺术历史的教育。为本校的教学服务，人才培养是它最重要的任务。我们的展览和收藏都围绕这个展开。”

理想博物馆

“这三尊佛像分别属于北魏、北齐和唐朝，大家看，它们的风格是不是更为写实了……”

近日，记者跟随着一批观众，聆听了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楼可程对“汉唐奇迹”特展的导览：从西周青铜方壶到战国狩猎壶，再到东汉嘉祥祠堂画像石、北齐娄睿墓壁画《狩猎图》，“短缩法”“坐标法”“凹凸法”，中国画家的写实表达体系就是这样一步步形成的。

“我们馆的特点在于它是一座文明史、艺术史的教学博物馆，其收藏和展览都服务于教育。”楼可程说，一方面，浙大艺博馆要培养学生对本国文明的认识，深化其民族认同；另一方面，也要培养学生的多元文明意识，开阔其国际视野。

“一流的大学一定要有一流的博物馆，博物馆对大学来讲，就像图书馆和实验室一样重要，对人文学科来讲，博物馆就相当于理工科的实验室。”在罗卫东看来，理想的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中心、展示中心和宣传推广中心，更应该是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而大学博物馆应该是五个中心的集成。

对此，《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薛芃也表示，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意大利的几所美术学院的美术馆，它们历史悠久，也拥有全球知名的收藏品，既是旅游热点目的地，又为学生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样本。馆方开设了很多专门针对学生的课程、讲座或修复项目，专业度非常高，与整个教学体系融为一体，是面对大众

的另一面。

为此，浙大艺博馆在开馆期间举办了一系列兼具学术性、思想性和通识性的公共教育活动，一批知名学者走上讲坛：曾见证“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重见天日的北京大学教授齐东方、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上海大学教授段勇、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石守谦……最近，由浙江省文物局主办的“新鼎讲坛——与考古零距离”系列讲座也在这座博物馆举行，浙江省文博系统的多位学者介绍了自己的最新工作。

博物馆定位

在被问及收入藏品的标准时，楼可程的回答中，有一句耐人寻味：“浙大艺博馆不是藏宝单位，所有的藏品都是教学和研究的实物证据。”

提到博物馆、文物甚至考古，公众最容易给它们贴上“宝藏”“寻宝”的标签。对此，“圈里人”并不认同。记者接触过的一些考古队员，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挖到宝贝”的说法。

“标准有二，其一是要满足浙江大学的教學需要；其二是符合全文明的收藏规划。”楼可程介绍说，他们在考虑收入藏品时，并不以作品的艺术品质为首要标准，需要的是反映不同文明、不同时代历史的文物和艺术品。为满足教学和研

究需要，文物数字化的数据，以及高品质的复制品也纳入收藏范围。

像在第三厅展出的“汉唐奇迹之北朝记忆——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壁画数字化展览”，就是中国墓群壁画首次在出土同时实施全面数字化信息记录的成功案例。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数字化团队应山西方面邀请，分四个阶段进行了墓群壁画田野信息采集，并在实验室计算融合形成了原真数字档案。

所有的定位，仍然是服务于教学。白谦慎介绍说，博物馆明年将开设的教学常设展，将为首校本科生的艺术史通识课提供实物，他同时也希望，研究生能够在老师和专家的带领下，参与到博物馆的建设中。他还希望在研究生教学层面，增加鉴定的内容。“对于我馆的收藏和展出而言，鉴定都非常重要，特别是赝品流布很广的情况下。”

“我的第一堂艺术史课就是1990年秋天在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的库房里上的，我的第一个公开的学术演讲就是1991年春天在耶鲁大学美术馆做的。我自己的成长就是和博物馆紧密联系在一起。”白谦慎说，他最为欣赏开放的、把收藏、展陈和教育结合在一起

文明无关“宝藏”

浙大艺博馆以覆盖人类不同文明、不同时代的艺术作品为长期追求的目标，目前收藏了约1000件藏品。它计划在20年内，建立一个包含人类不同文明代表性作品的教学收藏。

而藏品来源则分别是捐赠和购藏。馆内专业人员会根据规划，对征集的藏品进行预审。如果馆内缺乏相应门类的专业人员，他们就会向国内外专家作咨询，一些通过预审的收藏品，还会经由浙江省文物部门鉴定。楼可程说：“我们的筹建过程一直得到国家文物局和全国文博系统的支持，像‘汉唐奇迹’特展就得到了全国12家文博机构的帮助。”

而在“中国与世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新获藏品展”上，中国艺术品全部来自捐赠，展品的时间跨度从唐代至上世纪中叶，内容涉及书画、碑刻、瓷器、漆器、金铜造像等，而外国艺术品主要来自购藏，涉及埃及、希腊、东南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其中的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西亭记》残碑，就得益于浙大校友的捐赠。它属于颜体书风完全成熟阶段的作品，立碑于唐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夏历四月。但从宋代开始，人们就没有见到过这座石碑，甚至连拓片也没有见到过，只能在相关的文集中见到碑文。

尽管意义重大，但是馆方并不愿意给它冠以“镇馆之宝”的名头。这件“重量级展品”也没有罩上玻璃罩，而是给了观众近距离观赏的机会。在他们看来，每一件藏品、展品，都有着传递文明的意义。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是浙江大学校歌的开头。而刚刚起步的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也同样需要这样的气度。

“无论大农小农均应用科学方法”：蔡元培曾为中国农学鼓与呼

新近发现的蔡氏讲演佚文琐谈

肖伊锐

1930年8月29日至31日，北平《世界日报》分三次连载了一篇报道，题为《中华农学会在青开年会详情》，蔡元培等均出席并有长篇演说。其中，关于蔡元培在青岛发表演说内容，据查证，目前各版蔡氏全集及文集中均未辑录；当属“佚文”，具一定研究价值。在此酌加整理：

略谓本人久仰中华农学会成绩优良，此次得到会参加，无任荣幸。查青岛出口货最多，而林业渔牧畜产等业，均非常发达。故鄙人以为贵会，在此开会，必得很多的参考材料。吾国东北西北面积广大，宜于大农，应由政府设法开垦；东南各省人稠地密，宜于小农，应以合作的办法，设法改良。但无论大农小农，均应用科学方法，并须如许主席（译误）所谓成为中国独立之农学，然后乃达目的。总之，希望贵会诸公脚踏实地实际做去也，研究院现无农业组，但注重研究社会问题，惟社会问题中已有一部分研究农村经济。研究方法首为农村调查，次及农业统计。研究地点，现分无锡保定二处，此不过为举例而已。贵会会员有千余人之多，各省各道，当能普及，倘各就本乡分途调查，再加以统计，成绩当有可观。再贵会如以研究所得，建议政府，亦当可一施行也云。

这300余字的演说简辑，虽不是蔡元培当天演说的全部内容，但其对中华

农学会的关心与期望，还是简明扼要地表达了出来。据报道可知，中华农学会第十三次年会于1930年8月23日在山东青岛召开，恰为建会五十周年，“是日到会会员，北至平津，东至辽宁，南达广州，均有出席者，连同来宾，计共一百余人，颇极一时之盛”。那么，蔡元培与中华农学会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与事迹呢？据查证，蔡元培并未加入过中华农学会。他此刻在青岛出席中华农学会第十三次年会，也并非专程前往，而是于同在青岛召开的中华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之后，顺便作为嘉宾出席并致辞的。他在1930年8月12日的《中国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讲话中提到，“就现在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贡献来说，青岛在三十年以前，不过一个渔村……有今天这种的繁荣，并且青岛的地价，一天一天的增高，人口渐渐稠密，这没有一件不是科学的帮助和科学的成就。”（详参：《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8）

显然，这一套以开会地点青岛为例的说辞，从中华科学社年会上的讲话，再套用到中华农学会年会上的嘉宾致辞中去，也是相当适宜的。毕竟，现代农业正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农学作为科学的一支重要的应用分支学科，二者都是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主要贡献者。

事实上，作为近代学术早期社团的中华农学会，与中华科学社不但有着“实业救国”“科学启蒙”的共同诉求，在二者

发起与创立过程中，也颇多相似之处；两个社团之间的发起人、创始人群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说，中国科学社最初由中国留学生于191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创办，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雋、赵元任、杨杏佛、过探先等。两年后，1917年1月30日，上海召开了“中华农学会”成立大会，发起者则有过探先、王舜成、陈嵘等。其中，过探先既是科学社的发起人，又是农学社的发起人；在各自的社团工作中，与蔡元培有过交集的。过探先（1886—1929），是我国著名农业教育家、棉花育种家和造林事业的先驱者。他是江苏无锡人，自幼不溺于章句之学，而独喜科技艺术诸书，尤注意专门学术。1910年考取第二次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1915年获康大农学硕士学位后归国。被任命为江苏省立第一农校校长，1919年应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之聘，主持棉花育种工作，1921—1925年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教授、农科副主任兼农艺系主任和农业推广部主任。

1929年1月，蔡元培以中研院院长身份，聘过探先、李四光等七人，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委员。但当年3月23日，因工作过分繁重，积劳成疾，时年仅43岁的过探先早逝。蔡元培为其遗像亲撰像赞，词曰：

“毋辱原田，以农立国。画而不进，遂荒其殖。先生念之，奋起致力，造林植棉，

科学组织，远近闻风，从者如鲫。一身病歼，鹏搏折翼，威仪俨然，被困太息。探先先生遗像，蔡元培敬赞。”

中华农学会创立之年，1917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加入中国科学社，当年被选为该社首位特社员。应当说，虽然这两个学术社团没有过多过密的人员交流与资源整合，但皆为海外留学生创办，皆以“实业救国”“科学启蒙”相号召，是同为一种时代产物而相互呼应着的。虽然帝制已推翻，作为革命成果的民国业已建立，但旧式思维与观念仍普遍存在，政局动荡不定，尊孔、祭孔的“开倒车”之声依旧喧嚣，复辟闹剧还不时上演。与此同时，科举业已废除十年之久，但新式教育的成果，还远没有达到可与社会实际运用相结合的地步，一方面是“百废待兴”，一方面却是“资源闲置”。大批留日学生和一些留美、留欧学生回国，科学技术人才却仍然极其匮乏，供他们发挥才能的科研机构更少之又少，集合人才的学术团体也只有在南京、上海成立的影响极小、范围狭窄的中国林学会、中华农学会等，中国科学社与丙辰学社还没搬迁回国，偌大的中国只有南京高等师范等少数学校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等是这些人才的集聚地。

这即是当年两社初创之际的时代状况，蔡元培等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通过不断注资与成立改组董事会等诸多办法，并通过蔡元培身兼政府文教要职的政治背景，逐渐打开了中国科学社发展的新

局面。而中华农学会也已开始受到政府重视，规模日益扩大，会员分布日益广泛，学术成果也有望转化为政府决策的依据。在这种情势之下，蔡元培以会外嘉宾的身份，出席中华农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也算是水到渠成、顺水推舟之举罢。



▲蔡元培在青岛出席中华农学会年会讲演之报道，原载北平《世界日报》。